

哈佛教授卢春玲：

要从战略上思考全球健康

本报记者 杨子岩

跨界研究的学术“达人”

“永远保持学习的心态，就容易克服各种干扰和困难，专心前行。”对卢春玲来说，人生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复旦大学比较政治学专业硕士毕业后，28岁的卢春玲留学来到了美国，开启了自己的留学与学术道路。

留美之初，卢春玲攻读的是社会学博士，读了两年，发现整个方向与自己的理想有距离，决定转读经济学。

经济系主任说，来我们经济系要有一定的线性代数和微积分基础。“我就跟他讲，我暂时还没有，但这个寒假，我可以把它们补上。”卢春玲回忆当时那个极其冒险的决定时说：“15岁时我上了文科班，就不学数学了。当时已经30岁了，要重新开始学数学，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

系主任说，那你试试看吧。结果寒假结束之后，卢春玲自学完了线性代数和微积分，成功转入了经济系。她跟着后来成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的著名教授攻读公共财政学，以优秀的成绩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政治学硕士、社会学硕士、应用统计硕士，经济学博士，全球健康政策博士后……如此丰富的学术履历，让人惊讶于一个人怎么能有如此精力奔走这么多研究领域。

至于为什么走上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卢春玲说源自于美国有名的病毒学家写的《第四级病毒》。“该书主要讲他们在上世纪70年代追踪埃博拉病毒在非洲爆发的经历，对当时贫困、战争和疾病带来的非洲卫生体系的落后有生动的记录。”

这本书把她的视角带到了非洲大陆，投身全球公共卫生事业的想法开始在心中萌发。

2000年，联合国提出新千年发展计划，八项发展计划中有三项直接和全球健康相关。2004年，卢春玲加入了刚刚成立的哈佛全球健康研究所。2008年，现任世界银行行长、时任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全球健康与社会医药系主任金堉教授为她提供了该系的讲师职位。现在，卢春玲已是终身教职轨道上的助理教授，哈佛医学院全球健康经济及社会变革项目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人口与发展中心附属教授。

作为专家，她曾任世界银行投资环境部专家组的成员，先后为墨西哥、卢旺达等政府卫生部提供政策咨询。她和她的研究团队在医学卫生领域内的著名杂志上



卢春玲教授在哈佛大学的办公室

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受一些国家卫生部和世卫组织的委托，发布卫生改革评估报告，参与世卫组织疾病防治指导方案的撰写，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奶奶去世让她找到专业方向

“人的一生可能总会在某个时刻停下来，静心问自己这辈子到底想要干什么。”经历过多学科学术训练的卢春玲也有这样的疑问。

在攻读经济学博士时，导师和她讨论论文选题，问她对什么感兴趣。

“那时候，我只知道埋头学习每门课，没有想过自己的学术兴趣。后来导师启发我，你有没有觉得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遗憾，你希望改变它，从而让其他人没有遗憾。”

也就是这句话，成为卢春玲以后学术方向选择的导引。

“我从小和奶奶在一起，感情很深。奶奶住在农村看病困难，她老人家去世后，我常想，如果她能及时得到医药服务，也许我还能来得及报答她。我希望这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深深遗憾不要在别人身上发生。”就是

这个想法，让她找到了专业方向。

加入哈佛全球健康研究所后，卢春玲在全球卫生领域著名教授的带领下去做“墨西哥医改评估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她主持了对卫生公平、质量和效率领域的评估，学术视野得到了很大的拓展。

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学生不同，卢春玲是在中西两种不同的教育体系成长起来的。“在学术分析时，我接受的中国教育注重宏观把握，而西方的学术训练则更侧重分析技术的科学性。”

在学术“大牛”团队的历练让卢春玲对这两种训练有了更深的体会。“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不仅仅只是卫生部门的问题，它还与很多其他因素相关，如生活方式、经济发展、环境、教育、干净的水和厕所，等等。”

这种认识让她萌生出更大的抱负。“我希望能够全方位地考虑健康问题，像我的那些导师那样，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分析全球健康领域的前进方向。”

课题聚焦中国公共卫生

目前，卢春玲博士的研究领域横跨全球卫生资源分布、全球卫生体制改革和全球人口健康状况评估三个方面。

虽然是做全球卫生研究，作为一名中国人，她对中国人的关注从来没有停止，希望用自己所学服务于中国这片养育她多年的土地。2009年，卢春玲发表了评估心理健康问题对中国社会的经济负担的学术论文，加拿大医学会刊对该文进行了点评介绍。2011年，她发表论文研究新农合在早期试点地区对“看病难、看病贵”的作用。

作为研究西方对外卫生援助的领军人物，她在非洲国家工作时，亲眼目睹中国在非洲国家帮助当地建立医院，听到当地人民对中国医疗队的赞叹。她希望有机会对中国对外卫生援助进行全面科学的评估，以填补国际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空白。

在她的一份有关中国的研究报告中，卢春玲提出根据各国已有的经验和国情，帮助决策者们设计、试验并评估改善弱势群体健康的一些创新手段，争取以较小的成本获得较大的受益，以应对转型中面临的公共卫生挑战，如心理健康、农村留守老人和孩童的照料等。

“目前，我正在尝试与一些地方政府、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合作，希望通过学术参与的方式，为中国卫生体制改革尽绵薄之力。”

这是她在做了10年全球健康研究后，报效祖国的一份拳拳之心。



协议落地，华商准备好了吗？

林思含

如果你身边有朋友在希腊经商，那么他的朋友圈里一定少不了希腊议会于16日通过援助协议所需的紧缩方案这条新闻。方案通过后，希腊暂时摆脱了退出欧元区命运，但必须面对增税、提高退休年龄等苛刻条款。对于希腊华商而言，新的问题已经出现。

等待太漫长

债务危机这片乌云已经在希腊上空徘徊了6年之久，希腊经济因此一蹶不振，并拖累欧洲整体经济发展。市场不景气，华商的生意自然受到影响。6月29日开始的资金管制更是让华商雪上加霜，现金需求量大的零售业越来越难做，银行关门后华商的资金也无法汇回中国。

“目前华商基本上是处于比较焦虑的状态”，希腊华侨华人总商会会长徐伟春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谈判失败、陷入僵局、开启新一轮谈判……希腊与债权方展开拉锯战，“脱欧”风声不时传出，并在希腊公投后达到顶峰。

徐伟春认为，华商当然希望希腊能留在欧元区，如果退欧，经济以及社会上一定会出现动荡。但是，比起对“脱欧”的担忧，希腊华商的焦虑更多来自于漫长的等待，即使议会通过了紧缩方案，援助协议的“另一只靴子”还不知何时能落地，目前华商最需要的是稳定的政局和一个好的市场。

“如果真的要退出欧元区，也不要老是拖着，该怎样就怎样，只有尘埃落定，我们才能安排今后自己的商业行为”，徐伟春快人快语，“我们最怕纠结和等待”。

税率成关键

“我们非常关心16日希腊议会投票这件事”，希腊华侨华人总商会执行会长李昂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其实这个协议通过的来说对我们海外华人是一件好事”。协议达成后，就有希望逐步解除资金管制，帮助银行重新开门，华商因缺少现金造成的经营困境也会慢慢好转。

但李昂不认为有了援助协议就万事大吉。“长远来看对希腊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它的条件太苛刻，各种税都要增加，这对希腊经济发展没什么好处，对我们华商整个生意的影响也是长久的”。

债务危机并没有给希腊旅游业带来太大的影响，2014年赴希腊中国游客人数增加40%以上，希腊旅游部还预计2015年这个数字将超过50%，形势大好，包括李昂在内，不少华商加入希腊旅游业，但现在援助协议所需的紧缩政策有可能改变这个局面。

“如果税率向上浮动，酒店、餐饮的消费都会增加，那么游客在希腊的平均费用就要相应提高，希腊的价位本来就比欧洲其他国家高，这样下去会对旅游业产生影响”，李昂有着自己的担忧。

徐伟春也认为，协议实施对华人来讲影响不小，“如果税高了，希腊人民的购买力就会下降，对我们的商业行为是一种伤害”。

主动调方向

面对可能到来的紧缩政策，希腊华商必须提前做出应对。李昂表示，“税率提高，旅游报价也会相应提高，这样会慢慢影响游客数量，但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能在价格上做相应调整，或者压缩部分利润，为了同时兼顾多方利益、诉求，各方都要做出适当的让步”。

而对于从事贸易行业的华商来说，“双向贸易”成了一个新选择。徐伟春指出，一直以来华商多将中国商品进口到希腊市场，当希腊市场可能因紧缩政策萎缩时，可以试着把希腊产品卖到中国市场。

“希腊现在需要现金，其他的东西也会便宜，中国加入WTO的保护期也已经过了，对希腊产品的关税降低，在低价格的情况下，希腊的产品在中国市场是有竞争力的”。希腊华侨华人总商会也会寻求机会，让华商能从双向贸易着手，发展自己的事业。

同时，徐伟春认为，希腊最大的出路是支持创业、引导创业，而不是一味紧缩，“应该通过地理位置优势、历史文化优势、岛屿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航海和文化产业”，“以希腊的优势来换取更多的资金和就业机会，创造更多商机”。希腊华商也要全力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互惠共赢，共同走出一条光明大道。

华人献爱心与当地人心手相牵

非福婧

近几年来，华人在海外频遭当地人诟病。外国人认为，是这些人抢了自己的饭碗，他们只知道一味索取，拼命赚钱。

然而，瑕不掩瑜，华人长期在外漂泊，享受海外资源的同时，不忘初心。他们献爱心，行善举。据委内瑞拉《委华报》报道，近日，委内瑞拉Apure省Guaduarito市发生严重水灾，当地居民流离失所，出现用水困难。中华会馆商会主席以及侨领等人赶往灾区，挨家挨户向受灾居民发放救灾物资。灾区居民感动地称，“你是我们的好朋友”。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人们往往显得束手无策，等待救援看似成为唯一办法。不久前，尼泊尔加德满都发生强烈地震，受灾地区华人并未袖手旁观。他们

募捐善款，运送物资。其中，5名华人自发组织赈灾，不顾恶劣的自然条件，将十多吨粮食从加德满都运到130公里外的阿基乔克村。除此之外，通过微信朋友圈筹集资金，他们为灾民买粮食，发粮食。村民雷努卡·巴斯内特在获得了半月的口粮后，向华人表示了强烈的感谢。

海外的华人，面对大灾大难，展现出淡定与人文关怀。救人于水火，他们像一缕和煦的阳光，温暖着万千外国友人的心。

平日里，海外华人也未停下“救人”的脚步，四处奔走，传递善良和美好。在南非，有一个名叫台湾佛教慈悲基金会的组织正在做着同样的事。这是一个由华人组成的佛教团体，宗旨是追求人员“本土

化”。于是，队伍中的黑人志愿者越来越多，同华人一起关爱艾滋病患者，为穷人发放生活必需品等。他们将每一位被救助者称为“感恩户”，感激他们给自己机会帮助他人。同时，组织者还鼓励“感恩户”向尼泊尔灾区献爱心，通过尽绵薄之力，学会与人行善。

由此看来，华人团体在慈善界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他们怀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大爱，回馈社会。不久前，巴西华人协会和圣保罗华助中心，作为非政府组织，当了一回慈善事业的领头羊。这两个组织在圣保罗市议会举行慈善捐赠活动，将价值15万雷亚尔（约合5万美元）的生活物资捐赠给巴西27家慈善机构，其中包括毛毯、食品和轮椅等。

无论是自发组织募捐，还是华人团体身体力行，爱心接力，他们向世界传递着一个共同的声音：把华人最真实、最深沉的爱播种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与当地人手牵手，用一颗心温暖另一颗心，与人行善，传递善良和大爱。

新疆华侨华人：

在疆生活工作经商很安心

15日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侨办举行归侨侨眷代表和在乌鲁木齐的华侨华人以及土耳其在疆经商人员代表座谈会。与会40余人畅谈看到、感受到的斋月，纷纷表示，在新疆生活、工作、经商很安心，不会受外国媒体歪曲事实报道的影响，将积极做好国外亲人的工作。

达仁汗·叶尔哈力是自治区侨联原副主席，他的女儿在哈萨克斯坦生活，他说：“作为归侨侨眷代表，我们有责任向国外亲人传递家乡真实的情况，告诉他们，斋月期间，这里的穆斯林都自由封斋做礼拜，各民族和睦相处，亲如一家。”

土耳其维吾尔工商业者协会副主席、乌鲁木齐土耳其名品贸易中心总经理乌里坎·奥孜吐鲁克，在乌鲁木齐出生、成长，1990年到土耳其经商。他的妻子是土耳其人。他说：“虽然我离开故乡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但我看到了新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信教群众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清真寺内的宗教活动有序进行，没人阻拦封斋。作为商人，我希望中土两国世代友好，更希望我的家乡中国新疆和谐、安定。”

家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长山子镇长山子村的马学良是一位企业家，他说：“我的叔叔在吉尔吉斯斯坦生活，爷爷在哈萨克斯坦生活，还有很多亲戚朋友在其他国家经商、生活，亲戚朋友们常打电话询问新疆的发展情况，我会告诉他们，我和家人都正常封斋，我

哥哥和弟弟都是清真寺的伊玛目，我家附近的清真寺做礼拜最多时有500人，回族、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群众都在一起做礼拜，在社区工作的汉族朋友很关心我们斋月的生活，送来食品、关注开斋时的食品安全，这些都让我很感动。”

“我来新疆做生意10年了，我娶了拜城县的姑娘做妻子，我们已经有了孩子。我在这儿做生意，在这儿生活，我就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就是新疆多民族大家庭的一分子。我看到斋月里乌鲁木齐市人民的生活都很正常，最近在土耳其出现的一些不和谐声音和事情，不代表土耳其国家和大多数人，也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土耳其华商塔菲克·阿力肯说。



载歌载舞的新疆民众



7月16日，2015年闽台（泉州）食品交易会在侨乡福建晋江开幕。图为食品模特在“中国食品经销商发展论坛”上走秀。

赖进财摄（中新社发）